

中国 ZHIXUE TONGGUAN

# 哲学通观

王思义 朱爱军 / 主编

易经智慧的源头

人文精神的特质

儒道互补的主流

内倾思维的模式

援佛入儒的精致

综合创新的趋向

吉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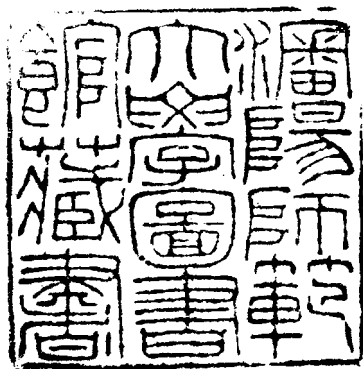


204437121

B2-09/2

# 中国哲学通观

主 编 王思义 朱爱军



吉林大学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通观/王思义 朱爱军 主编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2

ISBN 7—5601—2845—9

I. 中… II. ①王…②朱… III. 中国哲学史—哲学思想—研究

IV. 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7669 号

**中国哲学通观**

---

主 编:王思义 朱爱军

责任编辑:王亦农

责任印制:吉林音像出版社对外综合编辑室

---

出版发行: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网 址:www.hdhcb.com.cn

E—mail:xz1314@126.com

印 刷:内蒙古民族大学印刷中心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3

字 数:352 千字

版 次:200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01—2845—9/B. 109

---

定 价:20.00 元

## 自序

本书的写作是在学界吁求建构中国当代新哲学氛围下的思考，它是对整个中国哲学历程展现的概览：构建新哲学的吁求映射出中国哲学对民族化哲学的企望和对本土化哲学叙事的期盼，也代表了正在重新崛起的中国对自身文化意识与主体价值的觉醒。中国当代新哲学的建构，应当以广袤的视野、多元的维度，以放眼世界的胸襟、直面现实的勇气，把各种哲学资源作为建构新哲学的广阔理论背景，以中西哲学的分野作为基本的两大比照体系，通过相互渗透、会通、借鉴，取长补短，融铸出一体化的面向未来哲学。

建立中国当代新哲学首先要探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基本差异。西方人固有的思维方式为“存在是什么”，企图通过一系列的追问，把握住那隐藏在背后之恒定的“所以然气”“终极因”之“真存在”，这构成了西方哲学源远流长的“本体论”传统；中国人面对存在论问题时，其典型思维方式并不着意去追问存在究竟是什么，而是致力于寻求“如何达成存在之境”或者“如何成就存在的自由逍遥之道”，这构成了中国哲学特有的“境界论”传统。境界论和本体论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思考进路的存在论，反映着中西哲学在“存在”问题上所持有的不同的形上取向和旨趣。

西方哲学关于存在的本体论属于一种向外探求的形而上观念，中国哲学关于存在的境界论则属于一种向内思求的形而上观念。向外探求的观念意味着西方哲学总是倾向于把目光伸向人之外的世界，去寻求宇宙人生之最高真理、终极根据的价值取向。向内思求的观念则意味着中国哲学立足于人性世界，通过在人伦日用之中进行内在的自我提升，去实现天地人一体的圆融境界。

历史上,东西方民族分别发展了境界论和本体论传统,它们从不同的旨趣出发,沿着不同的方向,深刻反映出人类存在本性中两种不同的形上追求。就人类生存状态来说,人类需要通过“本体”和“境界”去把握存在,所以“本体论”和“境界论”构成了人的生命存在的“一体两面”。它们可以互相补充,却不可以互相替代。通过本体论的思考方式,人类对外部世界和人自身会有客观化的了解与认识,有助于生命的横向开展;通过境界论的证悟,人类会增加对生命意义的觉解,有助于生命深度的开掘。

一叶知秋,管中窥豹,书名中的“观”字就浓缩了中国哲学“境界论”的基本精神。观字在中国古籍中出现的很早,到《周易古经》时,就已经埋下了境界论的种子,具备了境界论的雏形。“观”是六十四卦之一,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二:窥观,利女贞。

六三:观我生,进退。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大意是说:祭祀中,只要能净手自洁(盥),可不必供奉祭品(不荐),关键是通过敬畏之貌(颙若)所透发出来的真诚本心(有孚)而进入人神合一之境:治国之道犹如祭祀之理,要避免幼稚的孩提之见(童观)和片面的妇道之见(窥观);观的完美境界是以生民的境况来制定进退方略,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要尊重他国的风俗;最重要是以生民为重(观我生),并作为坦荡的君子之人平生追求的志向(观其生)。不难看出,“观”是一种对生存意义的哲思、智慧,已经表征出境界的端倪。

《易传·系辞下》也有段精彩文字:“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

则现象于天，俯则现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这里映现出先哲庖牺，通过由远及近亦即从宏观到微观的统合，再采用由近至远即从微观再到宏观的类推，进而达到深邃的“八卦”认知模式，以此来“定吉凶，成大业”亦即统观复杂事物的整体与全貌。

孟子亦云：“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迭”（《孟子·尽心上》）。孟子以阐扬儒学为己任，感情激越，气势磅礴，笔带锋芒，睿智机辩。这里用山之高、海之大寓意儒学的浩瀚精深；同时笔锋一转——“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犹如日月之辉无孔不耀、流水至洼不盈不行，进而透发出“志于道”的完美境界。

可见，“观”既是对生命、生存意义的哲思，又是一种洞察体微的智慧，更是一种高洁圆润的境界。

本书在具体运思中：其一，以思潮为主线，分成九大形态，从易智慧开端直到当今“三大思潮”的互补互动，充分体现了这种宏观上的整体性和连贯性，即所谓“思潮泛起的浪花”。其二，以人物故事为辅佐，由于考虑文字量所限，在写作过程中忍痛割爱，删去了许多人物中的故事乃至整个人物，但在宏观的基础上，还是在选中的人物故事中作了较为详尽和细腻的描述，既体现了微观之效，又有雅俗共赏、以故事寓哲理的欣赏价值，即所谓“故事流淌的智慧”。其三，通览中国哲学，在于抽象出中国哲学易智慧的源头、人文精神的特质、儒道互补的主流、内倾思维的模式、援佛入儒的精致、综合创新的趋向等六大特质。

进入本世纪以来，如前所述，对于构建中国当代新哲学的吁求和思索，不仅内容体系较前宏阔，其立意、运思更有卓远之处，各种自圆其说之思理相激相荡，本书正是在这种语境下的一个构思。

此序于公元二〇〇六年早春二月沈阳陵西 王思义

# 《中国哲学通观》目 录

南哲王行

|                |     |
|----------------|-----|
| 自 序            | 1   |
| 绪 论            | 1   |
| 一、 中国哲学形成的历史条件 | 1   |
| 二、 中国哲学形成的基本特征 | 6   |
| 三、 中国哲学的逻辑演进历程 | 23  |
| 滥觞于易           | 28  |
| § 漫说易智慧        | 28  |
| 一、 三皇之首话伏羲     | 45  |
| 二、 羑里之囚周文王     | 49  |
| 三、 周公旦为政之道     | 52  |
| 子学争鸣           | 58  |
| § 漫说子学思潮       | 58  |
| 一、 道家智慧        | 64  |
| 二、 儒家智慧        | 72  |
| 三、 墨家智慧        | 86  |
| 四、 名家智慧        | 94  |
| 五、 阴阳家智慧       | 100 |

|                    |     |
|--------------------|-----|
| 六、法家智慧 .....       | 102 |
| 经学一尊 .....         | 110 |
| § 漫说经学思潮 .....     | 110 |
| 一、今文经学 .....       | 122 |
| 二、古文经学 .....       | 128 |
| 三、兼综古今 .....       | 133 |
| 玄学风度 .....         | 141 |
| § 漫说玄学思潮 .....     | 141 |
| 一、名教出于自然 .....     | 160 |
| 二、越名教任自然 .....     | 165 |
| 三、名教即是自然 .....     | 171 |
| 佛学融透 .....         | 176 |
| § 漫说佛学思潮 .....     | 176 |
| 一、天台宗智顗 .....      | 185 |
| 二、唯识宗玄奘 .....      | 194 |
| 三、华严宗法藏 .....      | 200 |
| 四、禅宗慧能 .....       | 206 |
| 理学鼎盛 .....         | 211 |
| § 漫说理学思潮 .....     | 211 |
| 一、理学先驱 .....       | 227 |
| 二、“支离事业”程朱理学 ..... | 236 |
| 三、“易简功夫”陆王心学 ..... | 241 |
| 实学震荡 .....         | 249 |
| § 漫说实学思潮 .....     | 249 |

|                       |     |
|-----------------------|-----|
| 一、“异端”学人李贽 .....      | 161 |
| 二、启蒙先驱黄宗羲 .....       | 263 |
| 三、探究质测之学的方以智 .....    | 266 |
| 四、“联蹇不遇”的唐甄 .....     | 268 |
| 五、古代哲学集大成者王夫之 .....   | 271 |
| 六、“习斋”自号的颜元 .....     | 273 |
| 七、疾呼“后儒以理杀人”的戴震 ..... | 275 |
| 新学回应 .....            | 278 |
| § 漫说新学思潮 .....        | 278 |
| 一、嫁接中西的龚魏 .....       | 288 |
| 二、富国强兵的洋务派 .....      | 293 |
| 三、改良派的进化观 .....       | 306 |
| 四、革命派的进化观 .....       | 321 |
| 三潮互动 .....            | 332 |
| § 漫说现当代三大主流思潮 .....   | 332 |
| 一、自由西化 .....          | 341 |
| 二、现代儒学 .....          | 356 |
| 三、综合创新 .....          | 383 |
| 主要参考书目 .....          | 416 |
| 后 记 .....             | 417 |

## 绪 论

从整体上来说,中华民族的哲学是追求人与宇宙最完美的统一,即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这种理想不在天上,而在人间。如儒家所描绘的理想社会,既不是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基督教的天国,而是世间人伦日用的现实社会。又如,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虽然是指当权者的圣贤,但仍然是人,而不是神。孔子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告诉人们,这种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即“圣人”境界,通过道德修养是可以达到的,中国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理想,是以中国人文主义为前提的。中国的人文主义认为,人在天地间最为重要,只有人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张载语)。只有人才能发扬光大“天道”,并在实践中体现“天道”。中国先哲认为,天人合一就是做人的根本道理,懂得这些道理,即可做到与自然、社会、他人以及自我的身心内外的和谐,亦即成为“圣人”,而“圣人”的责任就是为实现天人合一的大同世界理想而奋斗。

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又是以道德理想为中心的。中国的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西方的人文主义把人作为单个的人,强调个性解放,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中国的人文主义则把人放在伦理关系中加以考察,讲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人文主义”,总之,中华民族哲学所追求的,是以现实世界为基础,以中国的人文主义为前提,以道德理想为中心的“天人合一”的理想。

### 一、中国哲学形成的历史条件

中国哲学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在中国这块古老、广袤的土地上

萌芽、成长、繁衍、承传。它有如蜿蜒奔腾的长江黄河,由万条涓涓细流汇归为巨大水系,从古至今哺育着数以百千亿的炎黄子孙。虽然它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但始终保持着中国传统的稳定因素,深藏着异于其它民族智能的基本特点与个性。这些特点与个性都是从深厚的民族生活的土壤里生长发育出来的,不了解它赖以生存的基础,它产生的根源与环境,就不能更好的理解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一)地理环境因素

世界各民族都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它为塑造不同文化类型和不同的哲学特征提供了内在的物质基础。当我们全面审视和考察中国哲学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时,也必须了解和把握我们的民族智慧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这决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者,也不是把一个民族的智慧产生的动因、特征以及文化等完全归之于地理因素,而是充分肯定物质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各种各样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前提下来认识和理解这一问题的。当然,地理环境毕竟给人类文化智慧的创造提供了某种特定的历史舞台,这种特定的历史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文化智慧的发展趋向,而且人类社会越接近原始阶段,这种影响力也就越大,从整体地理环境来说,按照地理环境的差异,人类可以粗略区分为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典型的海洋民族国家,人们生活的空间相对比较狭小,利用海洋漕运之便,往往商业比较发达,人员交往和流动方便;又由于内陆空间有限,回旋余地不大,造成向外拓展的动机。中国整体地理环境的格局恰与海洋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反。其主要区别是:

其一,中国有极为广袤的疆土,其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长江两流域平原毗连,没有明显的天然屏障可以析划,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较海洋诸岛易于统一,所以历史上强悍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国纵使丧失了首当其冲的黄河流域,仍有广大退路可供回旋。其他古文明地区沦亡于外族的人侵,即一蹶不振,独中国能对外族潜移默化,始终保持着自己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并使之

绵延不绝。

其二，中国有较易于隔离的地理环境。东面临海，西北横亘漫漫沙漠，西南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青藏高原，平均高达四千至五千公尺。这些都是地理上的阻绝地带，给予农业民族无法突破的限制。这种一面临海，其它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使中国没有向外部世界拓展的野心，养成了独自经营、和平温顺的国民性格。所以中国文化大体上是在本土独自酝酿成长，虽偶有外来文化成分由西域或海上传入，皆能雍容消纳，使中国文化的发展稳定而富于自信。

其三，中国的气候，也影响文明拓展的方向。古代巴比伦、埃及、罗马、印度等文明，都发源于暖温带而逐渐向寒冷地带发展，中国则相反。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雨量由东南至西北递减，而地势由东南至西北逐渐增高，多数河流由西向东或由北向南注入大海，这种自然条件，往往决定收获的丰欠，再加上南暖北寒的气温，造成南长北短的农作物生长季节，这些条件对农民的垦殖发生吸引，所以形成人口南移、文化南进的趋势。

其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早在秦汉时期，就拥有六千万人口，而耕地面积却远远不足。再加上封建贵族的土地兼并，这样不得不使农民在所分得的狭小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对土地作最经济的利用。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条件下，虽然忙碌辛苦，也仅能糊口，这便养成了安土重迁、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对他们来说，土地就是生命，离开或失去土地就意味着贫穷与死亡。这种经济上对土地的依赖，反映到民族心理上则表现为对乡土的无限眷恋和对故土的深厚情怀。这种文化特色，形成中华民族最大的凝聚力。

## （二）农业经济因素

公元前三世纪有一部汇集先秦各派学说智慧的《吕氏春秋》，其中有一篇题为《上农》。在这一篇里，对比了农商两种人的生活方式：务农的很朴实，容易使唤；他们孩子般的天真，所以不自私，财物很复杂，很难搬动，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也不会弃家而逃。而从

商的心肠很坏,不听话;他们诡计多,所以很自私,财产很简单,容易搬运,国家一旦有难,他们总是逃往国外。《上农》篇由此断言,不仅在经济上农业比商业重要,而且在生活方式上农比商高尚。之所以称“上农”的道理也就在此。

中国是一个素称“以农立国”的国度,从新石器时代起,统治者都是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甚至今天依然如此。新石器时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就已经开始了农业活动。中国早期的农业生产,充分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在仰韶文化区的西安半坡村地窖中,发现成堆的小米,这是目前所知人类最早的谷物栽培记录。其他遗址如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华县柳子镇泉获村及山西万泉县荆村等地,也陆续发现小米痕迹。这说明,在仰韶文化区内,小米似乎是当时的主要食物。谷物耐寒性较强,至今在我国北方的广大耕作区内仍是主要作物。仰韶文化分布区主要是黄土高原。据地质学家研究,黄土高原的形成多半是数十万年来由戈壁吹来的黄沙覆盖而成,其土质结构松软多孔,有较强的渗水性,遇到雨水,可以象海绵一样对水起保存的作用,水份渗入深处,蒸发缓慢,不仅能长期保存,且能在干旱季节,由地下经毛细管作用渐渐上升,供给作物根部水份的需求。再加上黄土的风化程度较弱,颗粒中所含矿物质不易流失,具有较强的肥力。因此,中国早期人类能够利用这些特点,在干旱环境下,以耐旱的谷物为食粮,反映了先民的聪明才智。

其一,在华东沿海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江汉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址均发现人工栽培的水稻,这也是目前所知世界人类最早的水稻栽培记录。河姆渡文化区分布在浙江余姚县周围,它与江汉流域的自然条件比较一致,都有低洼湿热的特点,与这种地理气候相适应,产生了“水稻文化”。

这就是说,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起源,是与黄河区域和江汉流域两种各异的气候地理环境相适应,而分别产生了以小米与水稻为主的不同文化,从而奠定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基础。这也是中国历代均重视农业发展的历史原因。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一样,均发源于

温带,然而农业起源却有着不同的特征。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及恒河流域都是利用大河泛滥后留下的沃土,再加灌溉,进行栽培小麦。显然,这完全是由于气候地理环境的相异而导致的差别。

粮食谷物的生产必须遵循一定的节气,所以人们不得不留心生活规律、自然现象、四季更替、气候变化以及日、月、星辰的位置与移动等等,这就促使天文、历法、算术、符号、文字、工具等得到发明和进步,而产生较多的文化。

### (三)宗法制度因素

不言而喻,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社会,人们组成了长期定居、依附可耕地、缺乏变迁、凝固性很强的农业氏族家庭,这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非常牢固的自然结合物,并一直被从氏族社会持续不断地保存下来,构成了古代中国最牢固的社会基础。尽管进入阶级社会,经历了各种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以血缘宗法纽带为特色、农业氏族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都很少发生变动。

因此,在我国整个古代社会,血缘氏族关系、宗法等级关系非常复杂,每个人都成为特定人际关系中的一分子,都有维护群体关系的义务。在家庭内部,首先要确立父亲的绝对地位,以父为中心,确立上下贵贱、尊卑长幼秩序,任何一级都不得有逾越行为。这种社会关系在观念形态上的表现,就是“孝”的价值观念。《说文》释“孝”,从老从子,子养父之义,强调的是对父辈的服从和奉养,这是孝的起点,如《孝经》说:“不爱其亲而爱他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者,谓之悖理。”由“孝”的价值观再往下推衍,便是“忠”。以农业氏族家庭为本位的道德价值观随之扩大,“孝”的实质也就成为“忠”的道德价值观念的主要含义。因此,“忠”与“孝”一样具有了最高的道德价值。《礼记·祭义》说:“事君不忠非孝也。”《祭统》又说:“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可见,“孝”是对家庭而言,“忠”则是对君主、国家而言;“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对“孝”的膨胀。“孝”、“忠”成为贯通家、国一体化的媒介。

作为当权者,势必要不断地把这种“孝”、“忠”的人伦关系进一步强化,以达到对宗法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强化人伦规范渊源甚早,似乎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就能见到它的影子。如《尚书·尧典》中,最早提出了人和人之间应当如何相处的记载,舜对他的大臣契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在宽。”这里所说的五品,就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父、母、兄、弟、子五种关系。从此,在我国就有了所谓“修其五教”并“布五教于四方”的说法。这就是说,应当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进行五种教育,即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内平外成”的目的,即把家庭关系处理好了,也就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了。

卜辞中有“教”字,据《说文》:从支从孝。在宗族的奴隶制国家里,“政”与“教”是合一的,行政即所以施教,施教亦即所以行政。殷人以“孝”来达到某种行政上的目的,亦即以“孝”为“教”,因而行政的“教”字也就是“孝”。

周人一向把传宗接代、尊祖和孝敬家长视为头等大事。所谓周“礼”就是以祭祀祖先神为核心的原始礼仪,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统化、扩展化所形成的统治法规。“孝”在礼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如《左传》中“孝,礼之始也”。礼的本位就在于尊祖反初,如《礼记》中“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

秦汉以后,以家族为本位的道德价值观,经过统治阶级的提倡与扶植,终于把“忠”、“孝”合为一体。因此,配合家族本位的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价值再往下发展,便是道德价值观念的系统化,即五伦与三纲。从此,中国宗族本位的伦理关系和道德价值开始被凝固化、教条化、绝对化,君成为凌驾于五伦、三纲之首的最高道德权威,全体臣民都要无条件地向君主履行道德义务,这是统治阶级为达到永享国嗣目的的必然结果。

## 二、中国哲学形成的基本特征

中国哲学,就是中华哲人对本民族生存、发展以及苦难、死亡的体验和感受,通过自己的表达方式、自己的语言系统,透发出来的价

值取向,并且在流变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

### (一)易经智慧的源头

美国易经考古学会宣称,二十多年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出土的一件印地安人彩钵上所刻的七个表意符号,表现出中国易经的卦象,与“复卦”内容相符,因而推断为受七千年前中国古代易智慧影响。这件高七厘米,宽十四厘米的彩钵,钵体有七个呈车轮状排列着的表意符号,与复卦的卦形不谋而合,也与中国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出土文物上的符号相近。因此,美国易经考古学会推断,早自七千年前,中国半坡氏族的后人即已辗转移居美洲大陆(据1986年6月3日《工人日报》)。易智慧的基础是八卦。传说八卦在遥远的伏羲氏时代就形成了。《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庖牺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而《系辞上》又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是古代传说,说古时在黄河中出现了背上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图形的神龟,伏羲由此得到启示,画出了八卦。

《易经》是对中华上古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周易》在三千年前,以历史的观点,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最早地、多方面地、系统地分析了上古的社会关系和概括了先人的自然知识。它首先着眼于生产,着眼于生产工具的发明创造、生活建筑、以及市场交易、交通、政治、文化,这在《易传》中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尽管《系辞下》认为《离》、《益》、《噬嗑》等的各种卦象是产生于庖牺、神农之前,未必符合历史,但是,《易经》则是在包牺所创造的网罟,神农所创造的相、来、建立的“日中为市”,黄帝、尧、舜创造的舟、楫、柞、臼、弓矢、宫室、棺梓,以及创立的书契和官治等等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易经》记载了从上古一直到殷周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经典和世界的宝书。

现代关于《易》学研究最重大的突破,是张政烺先生对甲骨、金文中所见“奇字”的破译——数字卦的发现(参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

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张亚初、刘雨两人在张政烺先生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搜集资料，并对这些资料重新区别，认为它们分属商、周两个时代（张亚初、刘雨：《从商周时代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81年第2期）。由于六爻所组成的数字卦已见于殷季的陶器、卜甲、彝器等器物上，由此引起学者对重卦起源及其他《易》学史上的重要问题的重新审视（参见饶宗颐：《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载《文史》第20辑）。

数字卦的发现使筮法至少在商代存在的说法得到支持。中国古代有《三易》之说，郑玄《易赞》及《易论》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周易正义·卷首》）《礼记·礼运篇》记孔子之言：“我欲观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郑玄注：“得《坤乾》，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礼记正义·礼运》）熊氏安生曰：“殷《易》以坤为首，故曰《坤乾》。”（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6页）《尚书·洪范》载殷商旧臣箕子为周武王言“洪范九畴”，即从九个方面讲治国的大经大法，其第七方面：“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贞，曰悔。”由此可见筮法为殷商时代所固有。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亦言夏、殷两代卜、筮兼用：“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吕氏春秋·勿躬》说“巫咸作筮”，而巫咸为商王太戊之臣。

上述资料都说明在夏、商，至少是在商代筮法已经存在。以前由于学者对这些资料的可靠性存有疑虑，因此多不据此立论。而近年商代器物上数字卦的发现，则使上述说法得到某种程度的支持与肯定。

周易古经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古、也是地位最显要的一部典籍。因为它最古，自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源头活水”的作用；因为它地位显要，所以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都受到它的影响而与之交融汇通。在《周易古经》思想的启迪、促发下，形成了一股蔚为大观的易学活水长流，这股活水长流“致广大而尽精微”，几乎渗透到了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